

AI时代高校辅导员的“数智依赖”困境与破局之策

胡思雨

江苏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徐州

摘要 | 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智能技术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育人全过程，有效缓解辅导员事务过载、专业储备不足、育人精准度不足等现实难题，但也催生非理性“数智依赖”问题。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自我决定、职业身份认同等理论，依托一线调研数据界定数智依赖的层级与场景分类，剖析其造成情感育人浅层化、专业能力空心化、职业价值消解三重危害，并从主体认知、心理动机、职业定位、角色失调四维阐释依赖生成机理，从认知重塑、核心素养培育、一体化保障等维度提出“数智善用”实施路径，为AI时代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 AI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角色重构；数智善用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教育数字化已然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核心趋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需将教育数字化作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路径、塑造新优势的关键举措^[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亦强调，要借助信息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2]。在政策驱动与技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人工智能（AI）技术正深度嵌入高校育人的全流程，涵盖学生管理、学业指导、思政教育以及危机干预等领域，为解决高校辅导员长期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全新途径。

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规模虽呈持续扩大态势，但师生比例失衡等问题依旧较为显著。庞大的学生数量加之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致使辅导员陷入“高

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困境。与此同时，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仍存在不足，“能力恐慌”成为制约其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在AI技术的教育应用方面，其赋能价值已得到广泛证实，凭借其流程自动化、大数据分析、智能预测等功能，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管理效率，精准识别育人需求，并为辅导员提供专业化的工具支撑。

在此情形下，部分高校辅导员逐渐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工具执行者”，“数智依赖”现象悄然浮现，引发了人文关怀缺失、专业能力退化、职业价值消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探究“数智依赖”的深层内涵、成因机制及解决策略，不仅是摆脱辅导员职业发展困境、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5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委员会辅导员专项课题（指导课题）“AI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困境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5FYHLX05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思雨，江苏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辅导员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文章引用：胡思雨. AI时代高校辅导员的“数智依赖”困境与破局之策[J]. 现代教育与教学创新, 2026, 1(2): 45-50.

<https://doi.org/10.68070/qbkest04>

高等教育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1 AI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新变革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双重推动下，AI技术凭借工具理性赋能与价值理性补位的双重特性，成为解决高校辅导员工作困境的核心支撑。这并非单纯的技术叠加，而是基于教育规律与职业特性的系统性重构。

1.1 科技价值对“本领恐慌”的消解

高校辅导员的“本领恐慌”本质上是职业人力资本与育人需求的结构性失调。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与指导者，在参与问卷调查的43位高校辅导员中，85.3%的辅导员日均处理事务性工作时长超过6小时，这导致使其在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等专业性职责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仅有32.2%的辅导员具备心理咨询师相关资质，29.7%接受过系统的职业规划培训，这种能力差距直接引发了“想育人却无资质和能力”的本领恐慌。而AI技术通过人力资本补位机制化解了这一困境，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例，在AI中输入学生心理状态的观测特征后，便可自动识别相关心理问题并提供个性化干预方案参考，从而弥补辅导员心理专业能力的不足，有效缓解了“本领恐慌”。

1.2 科技价值对“效率困境”的破局

辅导员工作的“效率困境”源自事务性职责的“高耗低质”。根据调查结果，92.3%的辅导员认为奖金评定、请假审批、晚点名、离校去向统计等重复性工作占日常工作的65%及以上，严重压缩了思政教育、生涯就业指导、谈心谈话等工作时间。AI技术依托流程自动化与大数据协同机制，能够实现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效能变革”，通过流程优化与重构，剔除无效环节，强化核心环节，实现跨部门协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1.3 科技价值对“立德树人”的靶向赋能

传统模式下高校辅导员依赖“经验判断”，难以兼顾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在思政教育中，传统“大水漫灌”式的主题班会覆盖率虽高，但与学生自身需求的契合度欠佳；在危机干预中，人工排查难以提前识别隐性风险，如情绪低落但未表现出极端行为的学生，容易导致干预滞后等情况。AI技术基于用户画像理论与预测算法，实现育人的“靶向赋能”，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多源数据（如学业、消费、社交、心理等）构建学生成长数字档案，精准识别需求与风险，不仅提升了育人成效，更使辅导

员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预防”，体现了立德树人工作的前瞻性要求。

2 AI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困境的内涵与危害

AI的工具赋能存在明确的应用边界，若辅导员过度依附数字工具、主动让渡育人主体权责，则会形成非理性“数智依赖”困境，从育人实效、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等多个维度侵蚀思政工作根基。

2.1 “数智依赖”困境的概念与分类

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是指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育人场景后，辅导员形成的非理性工具依附状态：过度依靠AI处理事务、生成工作方案、回应学生诉求，主动放弃学情自主研判、独立价值判断与面对面情感沟通，将AI输出结论直接等同于工作成果，长期依附技术导致独立育人能力衰退、职业主体性弱化，最终从“育人主导者”沦为“技术执行者”。依据依赖程度与应用场景可划分为两类（见表1、表2）。

表1 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的程度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by Degree

轻度依赖	在事务性工作（如通知发布、数据统计）中优先使用AI工具，核心育人环节仍保持自主决策，未出现能力退化。
中度依赖	在学业指导、方案设计等专业性工作中频繁套用AI结果，自主分析与创新能力有所弱化，开始出现“路径依赖”。
重度依赖	在价值引领、情感沟通等核心育人环节依赖AI替代，丧失独立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职业认同与育人成效显著下滑。

表2 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的场景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by Scenario

事务处理型依赖	集中于奖金评定、请假审批等流程性工作，依赖AI实现自动化处理，规避基础工作实践。
方案生成型依赖	在主题班会设计、公文写作、研究论文撰写等工作中，直接使用AI生成的框架与内容，放弃自主创作与调研。
价值判断型依赖	在学生品德评价、职业适配度分析、心理状态研判等工作中，以AI数据结论替代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感知。

2.2 “数智依赖”困境的危害

2.2.1 育人本质异化，情感劳动浅表化

高校辅导员的核心育人价值应构建于“深度情感投入”与“具身性互动”之上，即通过谈心谈话时的共情倾听、危机干预时的情感支持，搭建“人与人灵魂对话”式的育人联结。然而，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使这种情感劳动从“深度交流”异化为“浅表操作”：部分辅导员借助人工智能自动回复学生在人际关系、职业困惑等方面的复杂诉求，以标准化话语替代个性化情感回应；在主题班会设计中直接套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方案，舍弃结合学生思想动态的情感化教学规划。这种“技术替代人工”的方式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人文温度，而且数据判断也掩盖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表达”的独特性，进而引发了情感联结断裂这一根本性危机，破坏了数字环境下情感育人的“双向流动”特征，使学生难以体会教育者的人文关怀与价值温度，师生间基于信任与共鸣的情感纽带逐渐消解。

2.2.2 专业能力“失养”，出现专业能力空心化

AI算法的“数据茧房”效应削弱了高校辅导员的批判性思维与育人创新的空间，使其陷入核心能力退化和数字韧性不足的双重困境。AI对事务性工作的替代以及方案生成功能，逐渐剥夺了高校辅导员锻炼核心能力的机会，导致核心能力“失养”。例如，在学业指导中，辅导员放弃剖析学生成绩下滑的深层次原因，仅转发AI生成的提升方案；在公文写作和研究论文撰写中，依赖AI生成框架与数据，而未亲自参与实际调研。另一方面，依赖又加剧了“数字韧性不足”，长此以往，辅导员的学情研判、思政创新、科研探索等专业能力不断弱化，形成“依赖—能力退化—依赖增强”的焦虑循环，最终形成核心能力与数字技能的双重短板。

2.2.3 职业价值感消解，陷入职业发展困境

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本应锚定“育人主导”的业务逻辑，以“立德树人”为核心，通过思想引领与情感关怀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数智依赖”催生的错位逻辑，使职业价值从“育人主导”异化为“技术附庸”，特别是当情感投入的质性价值（如学生思想转变、人格成长）无法被AI量化，而数据达标的技术操作（如数据报告）更易获得认可时，辅导员的职业价值逐渐降维，从“人生导师”沦为“AI工具操作者”，逐渐陷入职业价值空白，职业锚的模糊导致职业认同感持续下降，部分辅导员将AI的工作成效等同于自身价值，丧失职业成就感与发展动力，甚至出现职业倦怠，影响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与专业化建设。

3 AI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智依赖”困境的成因机制

“数智依赖”的形成是辅导员个体认知、心理机制、职业定位与技术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需从理论认知、心理动机、职业发展、角色认同四个维度解析其深层机制。

3.1 育人主体性缺失导致“工具化”

结合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理论，技术本应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但若过度依赖，会反过来支配人类使人丧失主体性。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出发，辅导员是育人活动的主导主体，学生是受教育主体，二者需通过思想交流、情感互动达成价值引领。然而，部分辅导员对技术理性存在认知偏差，将AI的工具价值等同于育人核心价值，主动让渡主导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生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蕴含着不可量化的情感与价值，但高校辅导员过度依赖AI处理“数据层面”问题，容易忽略“情感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教育、网络思政等工作中，将AI生成的标准化方案、自动化回复视为“高效解决方案”，最终从“育人主导者”沦为“AI工具执行者”，进而陷入“工具化”困境。

3.2 动机与认知失衡强化“路径依赖”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工作自主性理论，“数智依赖”的心理成因可归纳为“动机弱化—认知偏差—依赖强化”的闭环结构。自我决定理论强调，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是人类内在动机的核心需求；工作自主性理论则表明，工作自主性的缺失会直接削弱个体的内在动机与工作投入程度。AI在事务性工作中展现出的高效性，逐渐剥夺了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自主性，使其无需独立分析学生问题、设计工作方案，进而导致其内在动机的核心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工作热情持续衰减。另一方面，在调查中，96.7%的高校辅导员认为“AI撰写公文的能力优于自身”，这种对比使辅导员将工作成效归因于技术因素而非自身能力，导致其自我效能感显著降低，也进一步促使高校辅导员回避独立开展工作，转而选择依赖AI以降低失误风险，最终使其丧失独立开展育人工作的信心与能力。

3.3 职业定位模糊引发“价值迷失”

结合职业锚、职业身份认同、角色模糊与认知失调理论，AI带来的工作替代性冲击持续扰动辅导员稳定职业认知。一方面，智能工具接管事务处

置、数据统计等基础工作，切断辅导员依托一线实操积累专业能力的路径，原有服务型、事务型职业锚失去实践载体；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看，辅导员借助数字工具节约时间精力的短期收益，是以损耗专业能力、消解职业价值为长期代价，原有数据处理、流程管理类核心竞争力被算法替代后，极易陷入职业价值空白。同时，技术压缩传统职业边界，辅导员未能及时将职业锚转向情感陪伴、价值引领等机器无法覆盖的核心领域，职业身份认同持续弱化，只能依靠高频使用数字工具维持表面职业存在感，陷入价值迷失。另一方面，传统育人模式下完整、闭环的工作流程能够持续强化辅导员职业成就感，AI介入后工作简化为接收、套用算法输出结果，碎片化参与割裂完整育人体验，叠加角色模糊引发的职责认知混乱，催生自身能力短板与岗位育人要求之间的认知失调。为缓解内在心理冲突，辅导员倾向于采信AI输出结论、将技术成效等同于个人工作实绩，主动依托标准化数字输出简化工作流程，最终形成难以挣脱的技术路径依赖，持续加剧数智依赖。

4 AI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价值认同与自我定位

高校辅导员的价值认同与自我定位，本质上是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之间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既不应否定AI的工具价值，也不能丧失育人的主体地位。这需要在辩证剖析AI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重构不可替代的价值认知与角色定位。

4.1 AI技术优劣势的辩证审视

对AI优劣势的理性认知是构建价值认同的必要前提。从辅导员九大职责的实践情况来看，AI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流程优化、数据处理等工具性层面，而其劣势在价值判断、情感联结等人文性层面较为凸显。二者的界限恰好与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与目的性的辩证关系相契合，即AI能够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效能，但无法取代其“培养人、发展人”的根本目标，这也决定了AI永远无法替代高校辅导员作为教育主体的“人文角色”。

4.2 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认同的重构

重构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认同，需要摆脱效率导向的误区，回归育人导向的本质。情感是思想引领的桥梁，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迷茫、焦虑、困惑，不仅需要解决方案，更需要情感支持。而AI无法复制育人的温度，这种师生情感联结是辅导员价值的“第一核心”，也是AI永远无法替代

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引领要求高校辅导员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有深度、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而AI无法达到此种“思想深度”，既无法自主深入挖掘学生思想深处认识偏差的根源，也不能通过正反类比、案例分析等生动的教育方式进行教育引导。因此，这种具有“思想深度”的价值引领是辅导员价值的“第二核心”。最后，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辅导员立足于新时代发展、学生特点、专业实际，将理论创新与工作实践相结合，能够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与方法，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而AI受算法逻辑的限制，只能在已有数据的范围内生成方案，无法突破自身的经验边界。因此，这种“不受限”的创新育人能力成为高校辅导员价值的“第三核心”。

4.3 重塑“人机协同”的新职业角色

基于价值认同，进一步明确了高校辅导员是育人活动的主体，AI是服务于育人主体的辅助工具这一主次关系。因此，高校辅导员的自我定位需从“传统全能者”转变为“人机协同的育人主导者”，具体可分解为：

一是数据解读与决策转化者。高校辅导员不应直接依赖AI处理的结果或结论，而应致力于深入分析AI生成的数据背后所蕴含的育人需求与时机，将数据转化为个性化育人方案。

二是情感与价值引领者。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AI处理“基础事务性工作”，如生成活动通知、统计参与人数等，从而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与学生的情感互动、价值引领以及教育活动质量提升中。

三是AI伦理与育人创新者。高校辅导员要关注AI的伦理风险，如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确保AI的使用符合教育伦理；另一方面，要探索“AI+育人”的创新模式，突破AI的“算法边界”。

5 AI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智善用”转向的破局之策

消解数智依赖，构建人机协同育人格局，核心逻辑在于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立场，将数字技术归位于育人辅助工具，从内在认知重塑、核心素养培育、外部制度支撑等方面形成完整的纾解体系。

5.1 重塑理性认知，夯实数智善用思想根基

认知取向直接决定数字工具的使用范式，辅导员需要跳出技术万能的片面认知，在育人实践中构

建主体主导、人机协同、伦理前置的统一思维框架。厘清人与技术的主次边界是认知转型的基础,各类数字算法仅可作为数据参考与方案辅助素材,学情深层研判、价值引导、重大育人决策等核心环节必须由辅导员自主主导完成。同时,始终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建立贯穿技术应用全流程的育人标尺,在开展数字化工作前预判工具能否服务育人目标,在应用过程中持续检视人文关怀是否缺位,在工作收尾阶段复盘实际育人成效,以此规避纯粹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陷阱。在此基础上树立伦理前置底线思维,充分预判数据泄露、算法偏见、人文消解等潜在风险,清晰划定技术应用红线,对学生品德定性评价、深度心理疏导等涉及个体精神判断的场景,不宜单纯依托算法输出结论,以刚性伦理规范约束数字工具的使用边界。

5.2 培育综合核心素养,筑牢数智善用实践支撑

科学认知落地依托完备的专业素养体系,辅导员需同步精进数据研判、共情育人、创新实践、伦理甄别四项不可替代的育人能力,形成区别于数字算法的核心竞争力。面对海量学生行为数据,要转变直接采信算法结论的惯性思维,形成依托量化信息挖掘学生隐性成长诉求的专业研判能力;依托专题研讨、典型案例复盘掌握基础数据分析逻辑,主动开展小规模一线学情调研,完成从简单读取数据结果到精准捕捉育人契机的能力跃迁。深度共情对话是数字技术无法复刻的育人优势,辅导员应系统研习心理学、情感教育相关理论,熟练掌握情绪疏导、共情沟通实操方法,增加线下一对一谈心交流频次,以倾听、陪伴搭建稳定的师生信任纽带,依托深度思想对话化解学生成长困惑,摒弃模板化线上机械应答模式。立足数字化育人转型背景,突破传统育人模式与算法存量经验的双重桎梏,结合青年学生媒介使用特征、专业培养特色探索数字技术融合育人新路径,扎根一线育人实践推进思政专项研究,自主设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网络思政内容,摆脱标准化模板束缚,持续推动育人模式迭代升级。同步建立常态化伦理甄别意识,主动学习数字伦理、学生隐私保护相关规范,明晰各类技术工具的应用权责边界,对算法输出方案、量化测评结论开展人工价值校验,及时修正存在偏见、缺乏人文温度的内容,杜绝技术滥用损害学生合法权益。

5.3 搭建一体化外部保障机制,完善数智善用制度支撑

数智善用的转型不能仅依靠辅导员个体自觉,教育管理部门与高校需配套完善长效制度体系,形

成培训赋能、多元评价、双向激励协同联动的外部支撑格局。面向辅导员群体开设分层分类的常态化成长课程,内容覆盖数据研判逻辑、情感沟通方法、数字伦理规范、智慧思政创新等维度,融合线上理论学习、线下案例研讨、骨干经验分享等多元教学形式,配套培训动态反馈机制,依据一线育人痛点迭代课程内容,切实提升培训实操落地效果。同步重构以育人实效为核心的综合考核体系,扭转单一以行政事务完成度为标尺的考核逻辑,将数据研判水平、谈心谈话实际成效、数字化育人创新成果、数字工具规范使用情况纳入核心评价维度,融合学生测评、同行互评、自我复盘多维评价方式,考核结果直接关联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等职业发展事项,校正长期存在的重数据指标、轻人文育人的考核导向。兼顾物质资源倾斜与精神荣誉塑造,构建完整激励体系,对深耕数字化融合育人、规范践行数智善用理念的辅导员给予科研经费、外出研修等发展资源支持,依托校园宣传平台、年度表彰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持续强化辅导员职业荣誉感;增设智慧思政专项课题、育人创新赛事等成长平台,充分激发辅导员平衡人机关系、深耕人文育人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2025-05-14) .
- [2] 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s7060/201712/t20171206_320698.html (2017-12-04) .
- [3] 曾小娟. 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困境与调适机制——基于高校辅导员的扎根理论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5(11): 131-139.
- [4] 万劼, 刘源. 数智技术融入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意义、风险和进路[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19): 41-44.
- [5] 姚昌, 冯建, 蔺立杰.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提升的应然指向与实践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8): 123-129.

The Dilemma of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in the AI Era and Its Solutions

Hu Siyu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Abstract: Driven by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thoroughly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uch technologies effectively resolv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university counselors, including heavy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reserves and inadequate targeted education, yet they also bring about the irrational problem of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Drawing on Marxist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hierarchical and scenario-based classific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It analyzes three prominent hazards triggered by over-reliance on digital tools, namely superficial emotional education, hollow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dissolution of professional valu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is elabora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educational subjectivity,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and role dissonance.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for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overing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and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chemes for advanc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and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Keywords: AI Era; University Counselors; Digital-Intelligent Dependence; Role Reconstruc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